

一个人与长安都城的确立

■张艳茜

公元前202年，一只小小蝴蝶的翅膀忽而一扇动，就将一个草根人物送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都城长安，因为这个草根人物的出现，而进入了中国和世界的视野与历史。

这个人应该与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都一样，是不朽的。然而，2000多年之后，走遍长安城的每一个角落，都不曾发现这个人的任何足迹。这是一个不曾被史学家详细记载的小人物，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靠山的平头百姓。他，便是娄敬，一位不显于外，曾经的一介戍卒，却几乎决定了大汉帝国初期一系列重要国策的人物。

娄敬在历史上出现得着实奇怪，出场也堪称意外。他可谓是乱世奇才，却生卒年不详。我们只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看到寥寥几笔，但也足以令这个戍卒名垂青史了：

“娄敬，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

娄敬，身为一名齐人，却一直戍守陇西，汉五年（公元前202年6月），娄敬从被征调去的陇西郡（今甘肃临洮）来到洛阳。此时的娄敬，一副西北人的打扮，且很是落魄：穿着破旧的衣袄，拉着大车。

一介戍卒，却极关心时政。娄敬听说汉高帝刘邦就在洛阳，而且决定要将帝都定在洛阳，他做出了一个改变自己人生命运和一座都城命运的决定。

此时的娄敬，扔掉了拉车子的横木，去拜见了同是齐人的虞

将军。娄敬对虞将军说，他要求见面见高帝刘邦。作为同乡的虞将军，看到娄敬穿着破旧的衣袄，好意劝娄敬：你不能穿成这样去见高帝。我给你找件好点的衣服换上。

娄敬谢绝了虞将军的好意：我如果穿着华丽的衣服，那我就穿华丽的衣服去见高帝；我现在穿着破旧的衣服，那我就穿破旧的衣服去见高帝。

公元前202年2月3日，刘邦在定陶称帝，当月，从定陶来到洛阳。三四月间，汉高帝刘邦在诸侯大臣的簇拥下，住进了洛阳的南宫。赢得了楚汉战争的汉王朝，第一个问题就是准备在哪里建都。

在踌躇满志的群臣们看来，首都非洛阳莫属，洛阳是周朝建国之初所建立的东都，周平王东迁后即位于洛阳。

都城是一个帝国政权的中心和心脏，为国之根本。选得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天下的兴亡和长治久安。定都，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首都选址问题，它还关系到人心所向、统治安全、资源分配。

穿着破旧皮袄的娄敬，在虞将军的引导下，竟然就面见了汉高帝刘邦：“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刘邦震惊之余，却从穿着落魄的娄敬身上，感受到不凡的气质。同时，刘邦大概也想到娄敬的衣食住行肯定成问题，所以刘邦先赐给娄敬食物。待娄敬吃完，刘邦才询问娄敬所来何为？

娄敬直言不讳地问：陛下定都洛阳，是不是要与周朝比较一下兴盛？

这正是刘邦心中所想。刘邦自然说：然。

娄敬斩钉截铁地说：不应该定都洛阳。娄敬对比刘邦取得天下和周朝取得天下的不同之处，从历史的、地理的、军事的、民心的等方面，陈述不宜建都洛阳的原因。这令刘邦意识到，立都城的确不只是地利的问题。无论洛阳有千般好，在尚且不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立洛阳为国都还不是最理想之地。

娄敬又详细论证了建都关中的重要意义，他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选择立都关中是明智之举。

定都是件大事，刘邦遂召集群臣商议。刘邦的手下“群臣皆山东人”，全都不愿定都关中：“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这让高帝刘邦迟疑不定。

退朝后，刘邦私下询问他一向非常信任的谋士张良。张良从洛阳和关中的地理形势着眼，为高帝刘邦做了详尽分析。

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煌煌巨著《史记》中，记录有娄敬和张良当年力荐定都关中的这段历史，其中描述关中地理环境的优美文字，读来荡气回肠：

娄敬言：秦地依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张良言：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

再合理的历史决策，假如没有人以坚定的意志强力推动，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刘邦力排众议，决定就采纳这个娄敬、张良的建议，“即日车驾西都关中”。汉五年八月，刘邦正式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小人物娄敬，大胆倡议定都关中，表现出的智慧和才能，深得高帝刘邦的赏识。刘邦对娄敬做出了两个封赏。一是赐娄敬姓刘，让贫困的娄敬有了家族的尊严。二是刘邦给了娄敬一个封号：奉春君。

汉王朝初始，选择建都长安，是巩固政权具有重要意义的步骤。在这个问题上，固然说明娄敬胸怀全局，颇具政治眼光，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刘邦慧眼识人，择善而从，不以人废言。

长安，长治久安，一直都是人类不曾改变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长安，这座古老的都城，因为娄敬的建言，开始了它作为都城的历史命运。长安，也因为汉丞相萧何的设计与督建，得以矗立在关中平原。

汉长安城是古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发源地、决策地，是与古罗马城并称的世界上最早的国际化大都市，因而有“东长安，西罗马”的美誉。不过，汉长安城是同一时期罗马城的4倍，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汉长安城是汉文化的发源地，汉族、汉人、汉语、汉文化等历史概念诞生于此。“文景之治”、抗击匈奴、独尊儒术、汉武帝世、昭宣中兴、编撰《史记》等历史事件，也发生于长安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安城，成为后来许多王朝关注的首善之区。据统计，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割据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共建立过217处都城，其中立都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长安。

宋代以前，先后有西汉、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十一个王朝，三位流亡皇帝，和三位农民起义领袖，曾把都城建在长安城，历时长达1077年，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现在，这座汉长安城的城市地面遗迹，还相当丰富。遗址内，未央宫前殿、天禄阁、石渠阁以及城墙等重要建筑遗址，至今仍矗立在现代化的西安城地面上，是中国现代都市遗址中保存较好的一座，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化遗产。

娄敬提出建都长安之后，又提出了多个重大问题的建议，都关乎汉王朝的安定、安远与长治久安，对初立的汉王朝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作为后来的西安人，在追思娄敬、感恩娄敬的时候，如果能在这座古城的某个地方，见到有关娄敬或是刘敬，为这座都城所作出的丰功伟绩的碑文，或是有一座实感强烈的娄敬塑像，让更多的西安人，更多来到西安的人，了解这座古城与娄敬的关系，了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影响历史走向的功臣，该是多么必要啊！

不过，尽管没有立碑，没有塑像，娄敬或是刘敬，注定将与长安古城城一道载入史册。

个体生命的无言诉说

■傅书华

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个体生命”的生存形态、存在形态，都进入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各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但由于有关“个体生命”的思想资源价值资源一向缺失，所以，如何让“个体生命”立足于大地之上，就成为了迫切需要得到回答却又暂时没有回答的时代性焦虑。无论是无法、无处安置的“沉重的肉身”，还是物质文明之后精神文明的失重，都是因此而发生。

明乎此，我们也大致能明白，为什么对个体生命所“在”的不知所以的惶惑及对此的无言诉说会成为今日中国思想、精神、情感的时代性“症候”，表现在中国当今的叙事文学中，就是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真相及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这种不定把握在中国当前大大小小的叙事文学作品中，时时可见，让你不由得感叹当今族群精神的撕裂与离散态的普遍。譬如1970年代生的山西作家张隘近期小说《独自看守》《不了了之》《构陷》等等，借一个心神健康的警官对作为社会病态的刑事犯罪领域的感受，写这种种作为社会病态载体的刑事事件其发生、存在形态真相的不可把握，写在

同窗记

■朱航满

读书近二十年，同学很多，但志趣相投者不多。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其实原本大家都是有着很多梦想的，但最终坚持并实现的，并不是太多。也正因此，我对能够始终坚持下来的几位学友，从心里充满了敬重。那些我很看重的读书种子之中，我的研究生同学卢冶比较特别。

我与卢冶接触并不算多，她曾特意向我推荐过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芥川龙之介全集》，我们曾相约各写一篇读后感来进行交流。她还曾为我介绍过一个修改书稿的美差，事情简单，但报酬丰厚，极大地缓解了穷书生读书而无钱买书的苦恼。

毕业后，卢冶虽然进了一家特殊的高校单位，但并未从事学术工作，很是烦恼。有次和她聊

面对矫治这种种社会病态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方法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时的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从而构成了在今天如何把握历史与现实及存在于其中的个体生命的一种隐喻。

当今中国的叙事文学是如此，那直指“个体生命”的精神、思想层面的内蕴着饱满的思想性的抒情文字，在这方面体现得就更为突出更为鲜明，虽然中华民族是个一向注重在现实世界之中现实生存的民族，其对精神世界的追问，一向是建立在在现实世界现实生存追问的基础之上，即如五四时代那轰动一时的恋爱至上的主题，也不脱此限，所以，这种直指“个体生命”的精神、思想、灵魂的文字一直以来相对稀少，但在今天，伴随着从未有过的“个体生命”浮出历史地表的广度与深度，这类文字却开始大面积地涌现。如同样是生于1970年代的山西作家闫文盛历时六年之久陆陆续续地创作出的数百万字的《主观书》即是一例。《主观书》由数百篇长千余字短几百字的零散篇章组成，读这些篇目，给人以读鲁迅先生散文诗集《野草》之感，充斥全书各个篇章的，是对生命之根、精神皈依、灵魂所在、人事真义等等的追问、反诘、质询、疑虑；让你感受强烈的是那种漂泊之感、惶惑之情、相互的消解、不定的

把握；是繁复、多义、艰深、晦涩、迷思……即如书名之副题“我一无所知”吧，诚如西川所说，一无所知是非同一无所知。在我看来，一无所有之有，是社会的既定，一无所有，是想求得社会之认可而不可得，是理想在社会既定中实现自己的存在而不可得，或者说可以说，是想在社会既定之外确立自身而不可得，其价值选项是明确的，苦恼来自于其所选价值的不能实现。但一无所知则不同，一无所知是对所有价值选项的全面拒绝，这些价值选项包括社会既定的，也包括自己对自己所曾选过的价值选项的否定，在一无所知中，有的是对现有价值选项全面拒绝的批判性、革命性，也有着找不到价值所在的惶惑与焦灼。

上述的时代精神表征，或许在1970年代生作家中体现得更集中与鲜明，他们对自己身所处的新的时代，有直接的生命感受，但又不能够完全认同，对之又找不到他们认可的话语资源对之给以相应的言说。明乎此，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闫文盛的《主观书》可以写几百万字，但却是由那长短不一的零碎篇章所组成，他们实在还没有完整的思想可供他们作系统的表述。明乎此，你也许还会明白，为什么他们无论是客观叙述还是主观表白，总是有着无法说

实在是越写越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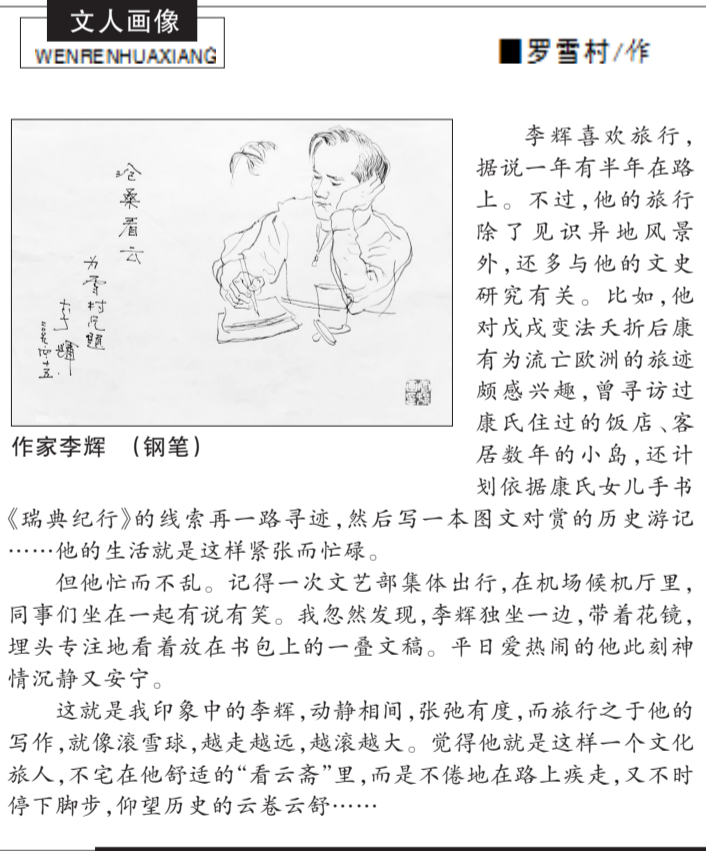
在我看来，《读书》杂志是中国最能代表当代读书人水平的期刊之一。卢冶在《读书》开设了“倒视镜”专栏，连续刊发了十多篇文章，并经北京的三联书店收入颇有声誉的“读书文丛”出版。这册《倒视镜》之隆重，还在它同时由黄子平和李长声写序。对于一位学术新人来说，这两篇特别的序言文章，几乎就是一种极为隆重的礼遇了。难得两位前辈序言不但写得漂亮，而且还充满了欣喜与赞赏之情。李长声先生在序言的末尾，还特别引用了李渔的一段话来勉励卢冶，令人感动：“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取教于古，中求肖于今，下不凯传于后，不过自成一家，云所欲云止。”

卢冶的文章讲究章法，文辞华丽，注重学理，引经据典，其中不少文章，切入巧妙，层层推进，

清楚的多义与不定，那实在是因为他们急于诉说，但却找不到用以诉说的语言，从而只能使这种诉说成为一种无言的诉说。在这样的一种生命情境中，他们很自然地目光投向作为自身之外的异域的西方向，譬如闫文盛就对佩索阿、尼采、卡夫卡特别的痴迷特别的情有独钟，但我想补充的却是，除此之外，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

间价值谱系中汲取营养，可能会更接地气。

在民族传统之庙堂文化、原有社会的权力结构、商业经济形成的金钱力量、西方强势话语等等多重力量的夹击下，中国式的个体生命虽然在前行中仍然举步维艰，但有着经济变革这一最根本最强大力量的推动，中国式的个体生命的“在场”与“言说”也许举目可待吧。



■罗雪村/作



作家李辉（钢笔）

《瑞典行记》的线索再一路寻迹，然后写一本图文对赏的历史游记……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紧张而忙碌。

但他忙而不乱。记得一次文艺部集体出行，在机场候机厅里，同事们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我忽然发现，李辉独坐一边，带着花镜，埋头专注地看着放在书包上的一叠文稿。平日爱热闹的他此刻神情沉静又安宁。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李辉，动静相间，张弛有度，而旅行之于他的写作，就像滚雪球，越走越远，越滚越大。觉得他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旅人，不宅在他舒适的“看云斋”里，而是不倦地在路上疾走，又不时停下脚步，仰望历史的云卷云舒……

颇具气势。她对于西方的一些现代理论颇为熟捻，有些解读电影和文学作品的文章，很让我想到北大女学者戴锦华，真是有一种看懂了解牛的感觉。我曾旁听过戴锦华教授的电影课，又读过她的专著，那种华丽、时尚的学术用语，以及对于研究对象的犀利潇洒解读，是很多学术女性推崇的对象。故而我读卢冶的文章，颇有一些似曾相识之感，不知是否是对她的误解。或许是沉溺过深，卢冶的文章有时会令人感到一些缠绕，但深入之后，又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受。我觉得她的笔或许有时无法赶上自己缜密繁复的思维。李长声先生评价卢冶的文字，乃是“三岛由纪夫式的华丽和井上厦式的饶舌，那是必须有知识以及学问垫底的”。长声先生还是眼光犀利。

我们作为同窗，最奇妙的一件经历，也是志趣相投的事情，还是与李长声先生有关。我颇

喜读长声先生的随笔，三联书店出版他的一套“长声闲话”五册，读后为报刊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于报端。不久，卢冶来电，说长声先生读了我的文章，很喜欢，不日将从日本回国，愿一见。待我们几人见面时，才知道卢冶也写过一篇评论，此文后来亦收录在《倒视镜》之中，甚得长声先生的赞赏。那日几杯清酒过后，长声先生颇为感慨，他说没想到关于这套丛书出版后，竟得两篇精彩的评述文章，不都是小朋友所写，还是一对同窗。那日别后，我们又是数年未见。再见面时，则是她从辽宁来看望师友，抽空特意到单位来看我，说及未来的打算，则是准备辞去辽宁那所大学的教学工作，准备到海南新建成的一家学院去执教。她说那家学院很安静，环境也优美，适合读书和静修。我听后并无惊异，而是唯有对她的祝福。

拜谒季羨林憩园

■张梦阳

2019年7月11日是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日。10日，临清市委、市政府联合聊城大学季羨林学院，开展系列纪念活动，举办运河名城大讲堂季羨林事迹讲座，拜谒季羨林憩园，参观季羨林故居，召开追思会，举行《高山景行——家乡人记忆中的季羨林先生》一书首发式。

我有幸受邀参加了这一系列活动。其中感受最深的是拜谒季羨林憩园。

10日清晨，市委领导率车队前往季先生的故乡官庄。下车看见门框是由方正的水磨石制成，上幅刻着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题写的白底金字“季羨林憩园”，门两边是黑底金字的对联：“集群贤大成学贯中外”“承历代师表德合古今”。黑色的铁栅栏门畅开着迎人吊唁的队伍。

这时，天空飘起绵绵细雨，仿佛寄托着人们对季老的无限哀思。

进门是一条狭长的白色石板路，两边是翠绿的松墙。沿路走去，迎面是一方刻着“季羨林先生”的黑色石墩，托着季先生的汉白玉半身雕像，在细雨中向人们淳朴地微笑着，栩栩如生。

雕像侧旁是季羨林先生的生平简介，黑底金字的横石立在灰色的石墩上。

雕像之后就是季先生和夫人之墓，三级台阶高，白色石刻围栏，黑色墓碑，后面是圆形的墓。高高的青绿梧桐树林遮盖下，右侧还有两尊形状一样的圆墓，紧挨着的是季先生父亲母亲的墓，再就是祖父祖母的墓。

临清市领导带大家敬献花篮、整理绶带，年轻的副市长郑学兰同志致辞，众人向季老墓三鞠躬，并参观了季老故居。然后，车队回到临清宾馆，由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磊同志主持追思会。下午又到憩园这座古色园林里参观了“季羨林与家乡”摄影图片展。傍晚，多数与会者散去，我想到父亲故乡大丁庄看一下，但怎么都打听不出这个村庄。我想到父亲去世时，季先生亲口对我说过：“你父亲的大丁庄官庄只十里地。”竟得到了官庄就等于去了父亲的故村，就毅然告诉司机改道，再次拜谒季羨林憩园。

一个人在园内漫步。憩园最适合孤独地沉思……

来到了季羨林身边，想起重读的季先生早期散文《母与子》，眼前浮现出他的母亲——“干皱的面颊，眼睛因为流泪多了镶着红肿的边，嘴瘪了进去；然而子不嫌母丑，季先生”一想到，我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遇到了这老妇人，便立刻知道，她不但现在霸占住我的心，而且还要永远地霸占住了。”

我读过许多篇回忆母亲的文章，而最刺痛我的是季先生的这篇《母与子》。

季老幼年家贫，六岁离家，叔父把他接到济南，走上求学之路，这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如果不跨出故乡，他可能会在故乡种一辈子地。

然而他却后悔离开家乡。有一次他听对面的邻居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饱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个日夜，眼望远方，期盼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始终没有回去，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后来他一直后悔，爱了不该不该离开母亲。

季羨林先生对母亲有着深深的爱，曾在多篇文章中有过深情的描述。九十大寿时，临清为季老贺寿，他在故居后面的父母墓坟前留影，在《故乡行》一文中写道：“娘啊，这恐怕是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您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您的身旁！”故乡的人们，始终铭记在季羨林先生心头，同乡也时时刻刻挂念着季老。先生逝世后，就围绕他父母亲的坟建立了憩园。2010年4月5日，季羨林先生和夫人的骨灰安葬在这里，实现了他生前的遗愿，回到了母亲身边。

世界上母爱是最伟大最难忘的。不爱自己的母亲或爱得不深的人，绝对不爱别的人，更不会爱祖国，爱故乡。

季先生把对母亲的爱倾注在83万临清人民身上，他尽其所能为故乡出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1991年9月23日，季老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聊城参加“傅斯年学术研讨会”之后，又来到憩园原址旁边参观名胜古迹，期间拜谒了临清的舍利塔。临清政府的同行人员告诉季老，他们一直想重修临清塔，但一直没有资金和能力做这件事。回京后，老先生就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写道：“我这次回故乡临清，当地的党政领导向我提出临清舍利塔的修复事宜。我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只好求您帮忙说话了。”季老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人”，更“不善于求人”，但为了保护家乡的文物古迹，为了满足家乡人民的要求，这一次竟破了例。1994年，季老还把自己获得的一万块奖金捐出来，设立了“官庄村季羨林教育奖励基金”，鼓励家乡成绩优秀的后生发愤读书。

下午回到临清市，井扬同志又陪我参观了运河文化区的季羨林纪念馆。建筑高大、气派，藏有各种珍贵的纪念品。我深深感念临清市政府和人民对季羨林先生的尊重和热爱！这是临清历来重视文化教育的表现，正因为这种厚重、朴素、坚实的历史传统，临清一个不大的县，出现了季羨林先生这样世界景仰的文化名片。如临清市委书记何宪卓同志所说：季老是临清一个非常宝贵的“精神宝藏”，在他身上，既体现着爱国、爱党的政治性，同时又有淡泊名利的大家气质；既有超越前者的自律自律，同时又有脚踏大地的人格魅力。季老就如同一坛浓酒，时间越长越发醇香，走得越远，季老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越加高大。我们应该继承、发扬、挖掘季老的人格魅力，共同建设好季老的家乡临清，这就是我们对季羨林最好的纪念。